

## 强化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中观调控

●石良平

### 一、中观调控起因：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呈非同步状态

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困扰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建国以来已经历了7次完整的经济波动周期，目前正处在第8次经济周期的高峰期。从整个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过程来看，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周期的时间在缩短。**从1952年到1981年的29年间，我国经济运行经历了5次周期循环，平均每一周期的时间跨度约为5.8年。而从1981年至今的11年间，已经形成了两次半周期循环，平均每一周期的时间跨度仅为4.4年。80年代以前的经济周期呈现出明显的5年计划的特征，而从80年代开始，经济周期则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特征。事实证明，经济的市场化更容易引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这一波动比之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周期性波动更不易把握。

2. **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在缩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对生产增长的预期无差异性，对投资的冲动具有同步性，因此经济波动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现象，并且在1960年、1967年和1976年出现过3次以经济总量绝对值下降为特征的古典型周期波动，而这类波动在不发达经济国家则普遍存在。进入80年代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古典型经济波动形态已基本消灭，并且经济波动的振幅在明显地缩小，这表明我国经济已开始步入现代经济运行的轨道。

3. **地区间经济波动的差异趋于明显。**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经济条件差异较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经济波动的力度并不一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物资的调拨来减少这种地区经济波动的差异，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市场尚不完备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在间接的宏观调控方面难以实现差别性政策，因此在实施全国经济稳定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这样就会使某些经济运行尚处在正常阶段的地区经济受损。在这方面，80年代上海经济在周期性波动过程中效益下降就是明显一例。

上海的经济结构以加工工业为主，能源与原材料主要从外省和国外购入，因而经济的增长速度受制于其他地区经济的景气状况。一般说来，对外依赖性强的经济，其增长的起动过程比较缓慢，而当资源产出地区的经济不景气时，由于乘数的作用，加工工业区的经济衰退过程则更快。从下表中的可以看出，整个80年代，上海经济的高涨过程始终比全国慢，而经济下滑过程始终比全国快，而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周期谷底 (1981)	周期峰顶 (1985)	周期谷底 (1986)	周期峰顶 (1988)	周期谷底 (1990)
全国工业增长速度	4.3	21.3	11.7	20.8	7.8
上海工业增长速度	3.7	13.5	5.5	10.5	4.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上海统计年鉴1992》。

由于经济起动的缓慢效应，使上海经济的潜力受到严重束缚。从整个80年代的经济运行实践来看，当全国经济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时，上海的经济却处在正常运行的区域之内。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出台，尤其是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往往使正处于上升时期的上海经济过早衰退，从而损失了大量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益。这些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中央的宏观调控尚未实行地区差别政策以前，建立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相适应的地区性中观调控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从整体上对全国经济在经济周期性过程中的损失减少和效益提高都是有益的。

## 二、中观调控基础：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周期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波动周期的运行轨迹，我们大致可以把经济周期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依赖外生冲击的周期，这类周期的特征是以最终需求的周期性变化推动总体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波动类型又可以分为由投资周期推动的经济周期，和由消费周期推动的经济周期。第二类是不依赖外生冲击的周期，这类周期的特征是经济体内各种推动经济运行的要素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这类波动产生因素可以分为产业结构摩擦型周期波动和通货膨胀推动型周期波动。

就我国来说，体制的变化对经济周期类型的影响很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是以投资周期推动的外生冲击型为主，它一般伴随着5年计划的制定和计划投资高潮的来临而形成有节律的周期性运动。从80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周期类型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阶段经济波动周期基本上以消费周期推动的外生冲击型为主，尽管其中也隐含着产业结构摩擦（以资源约束为特征）的非外生冲击的影响，但整个经济的运行基本上由消费热点所支配，并且随着居民家庭的消费重心向耐用消费品倾斜，一个完整的消费周期在这一时期已经完成。第二阶段从90年代初至今，这一阶段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我国经济的周期运动从以外生冲击型为主的形态转向以非外生冲击型为主的经济周期形态。1992年至1993年所形成的经济过热就与通货膨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通货膨胀的本质动因是货币问题，因此所谓通货膨胀型经济周期实际上就是由货币因素推动的经济周期。尽管这次经济过热从现象上看是投资过热引起的，但其背后却是一种典型的货币现象，这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计划投资周期推动的外生冲击型经济周期有很大的区别。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以计划投资推动的经济周期并不存在地区波动的差异问题，这是因

为中央的集权完全有能力通过投资资金的调拨在短期内拉平这种差异。然而在经济波动类型由计划投资型转向其他类型后，这种波动的地区性差异就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就消费推动型来说，不同地区收入的差异是明显的，这种差异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还不足以构成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动因。然而当居民收入提高到足以大规模购买耐用消费品时，情况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耐用消费品是区别于其他消费品的特殊商品，它具有一次购入、长期使用的类似投资品的特征，对这种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形成购买周期，而这种购买周期与各地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此外，对非外生冲击型经济周期来说，这种地区性的波动差异就更为明显。以这次经济高涨为例，由于本次经济过热是由货币政策引起的，以通货膨胀为特征的周期类型，因此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地区差异就取决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对成本上升的承受能力。而中央政府实施紧缩信贷的情况下，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就在于各自对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以及该地区的集资能力。上海以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很高。上海1992年的增长势头比较好，开始露出摆脱以往经济增长总是比全国低一轮的传统增长模式的端倪，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家实施了市场化金融政策后，上海集资能力比较强的优势开始显示出来，从而改变了以往生产和建设资金捉襟见肘的现象，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然而当中央实施一刀切的紧缩信贷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后，上海这一优势的发挥又受到了限制，并且很有可能使上海重新回到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去。在这种情况下，为使上海经济保证正常的稳定持续增长势头，实施必要的中观调控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

### 三、可选择四大中观政策调控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差异较大，在实施统一的中央宏观调控过程中常常会使那些经济发展比较正常地区的经济效益受损，因此在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各地应当配以适当的中观调控措施，以弥补宏观调控过程中的不足。

就上海来说，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波动周期已进入消费推动型与非外生冲击型相互交替的循环类型。因此所采用的中观调控政策可视不同的周期类型实施四类不同的政策。

1. **资产存量吞吐政策。**我国目前经济周期时间不断缩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过冷和过热的状态不能从经济体内部得到缓解，“软着陆”屡屡失效，必须依靠政府的强行调节。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期过程中资产存量得不到调整，经济体制不能通过资产存量的流动进行结构转换，以适应经济周期过程中社会需求对经济结构的要求。资产存量的及时调整是市场经济对经济周期的自动反映，它可以化解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哪一个地区率先从国有资产市场化入手进行改革，在经济周期过程中有效地通过国有资产的吞吐来缓解过热或过冷的经济，哪一个地区就有可能获得先发效益。目前我国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已逐渐形成高潮，但大部分人把这一改革的注意力放在明确产权、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促使国有资产增值等方面，没有考虑到对国有资产的吞吐是目前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宏观调控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对国有资产的吞吐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于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可以通过对国有资产股权的购买与转让来调节社会资产存量结构。对于尚未股份化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拍卖、租赁、转让经营权等方式促使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对于在周期冲击下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应尽快予以破产，通过资产存量的合理流动达到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在强化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所设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控股公司，除了其承

担的维护国有资产利益、保证国有资产增值的责任外，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通过对国有资产的吞吐来减弱经济周期的冲击。

**2. 货币供求缓冲政策。**为了防止国家货币政策的波动对地区经济带来的收—放—收效应，上海必须建立自己的资金缓冲库。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来看，居民的储蓄资金已经成为生产与建设资金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这个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80年代居民收入高速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所谓中观货币供求的缓冲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诱导政策，以改变居民消费和储蓄的比例结构。这一中观货币供求的缓冲政策包括：（1）继续大力发展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及股票市场的发育，是改变居民消费与储蓄结构的重要手段，它一方面把居民的消费基金永久地转变为生产基金，以减少消费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可以在依赖银行信贷资金以外，获得一份稳定的生产和建设资金。（2）大力发展共同基金组织，通过各种基金会形式吸纳社会闲散资金。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以基金会形式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有利于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也有利于通过社会各界的力量缓解经济周期过程中所形成的通货膨胀等不利因素的冲击。（3）发挥上海的土地区位优势，通过批租和有偿使用土地，来调节资金的供求关系。由于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必须在土地有偿使用的初始阶段制定严格的管理条例，争取充分发挥每一块土地的级差效应。对于目前尚待开发的郊区集体所有制单位所管辖的土地，应改变谁占有、谁支配的不合理状况，而由市政府全面规划，统一安排。

**3. 最终需求调节政策。**由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消费周期以及由货币政策决定的投资周期仍将对我国的经济波动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有效地调节消费和投资周期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由于地方政府掌握了一部分投资权，因此可以通过投资规模的增减来调节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从消费周期来看，其周期的主导因素是耐用消费品购买的周期性变化。从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我国城市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过程，这一过程以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家用电器的普及而告结束。90年代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周期将围绕以家用空调、电话、家用电脑以及高档家具为代表的新一代耐用消费品展开，其购买高峰的形成预计在90年代中后期。为了避免我国城市这一消费高峰的集中冲击所产生的生产能力从紧张到闲置的周期性损失，从现在开始必须对这一消费冲击进行分流。其中最有效的措施就是使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向居民住房投资。居民住宅建设是集消费品与资本品于一体的投资过程，这一过程能有效地避免消费周期对经济周期所形成的压力。因此居民购买住房的政策必须在明两年内出台，并且形成规范性制度。另外，在需求调节过程中，我们应当看到期货交易对减缓经济波动振幅的作用。一般说来，期货交易的数量和价格变化本身反映了购买者对未来经济变化的一种预期，而这种预期往往又是下一轮经济变化的动力。因此，期货交易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作出判断，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商品交易的延迟达到减缓周期波动影响的目的。

**4. 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从近几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推动因素看，尽管我国在9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以“市场疲软”为特征的经济衰退，然而资源约束形态并没有从我国的周期波动形态中退出。在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周期过程中，受损失最大的莫过于那些以加工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工业城市。上海在历次经济周期过程中受损失比较大，与上海目前这种以加工工业为支柱产业的产业结构不无关系。尽管这几年上海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上下了功夫，但仍没有改变工业城市这一基本特征。90年代为了减少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对（下转第37页）

工具就不少于四、五十种。反观我国，金融工具创新大大滞后，品种屈指可数，创新的工具更是寥若晨星。因此，适应“复关”后金融市场开放的要求，必须致大力于金融工具创新，除了继续推广储蓄支票、信用卡、商业汇票的使用范围，扩大票据贴现、再贴现业务外，还必须本着“先学后创”的原则，结合我国情况，引进国际金融市场通用的金融工具，如可变利率债务工具（可变利率存款单和可变利率抵押贷款）、金融期货合同、金融期权合同、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多重选择便利以及各种新品种债券等等。

### **五、改革外汇管理政策，建立规范的外汇市场**

我国现行的外汇管制政策和外汇留存制度与GATT的一系列原则极不适应，所以，必须尽快改革。在1993年5月下旬日内瓦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14次会议上，中国谈判代表团承诺，在今后五年内，中国将把两种汇率（官方与市场）统一为单一的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外汇券将按统一汇率兑换，并逐步把外汇额度留成制度转变成现汇留成制度；同时还作出承诺，中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将在五年内逐步从基金组织章程第14条过渡到第8条，即取消国际收支经常性交易支付的外汇限制，实行货币的自由兑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加速建立规范化外汇市场的步伐，在自由化、公开化、价格优先原则指导下，建立外汇交易的市场机制，使人们可以自由兑换所需币种，以迅速实现购买力在国际间的转移和国际结算的实施，以及国际资金的融通，以降低汇率变动产生的风险。同时，应取消企业调剂外汇的限制和调剂指导序列，增加币种，允许企业和个人套做外汇交易，并开办远期外汇交易。应允许企业全额外汇留存，可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外汇买卖，为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铺平道路。

### **六、加速制订有关金融法规，并尽早出台**

按总协定的惯例，缔约国应优先立法，否则“复关”后，我国境内的中、外资金金融机构在经营业务时将无法可依，处于被动境地；同时，我有关部门对外资金金融机构的管理也将因无法可依而弱化。因此，应加速制订有关的金融法规，如《银行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等；在立法时，应注意同国际上有关的金融法规和国际惯例相衔接。

### **七、加速培养精通国际金融业务的高素质人才**

金融领域的竞争，说到底人才的竞争。不论是金融创新，还是银行技术的现代化，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所以，为了适应“复关”后竞争加剧、国内业务与国际业务接轨的需要，必须加速金融管理和金融业务人才的培养，培养既通晓现代金融理论和业务、又掌握现代银行技术的金融人才。应采取分层次、多元化的培养方式，有高等院校培养输送，有高校与业务部门密切合作办学培养，有业务部门自己培训，也有送出国进行培养等等。总之，应不拘一格培养各种金融人才。

（上接第25页）上海经济增长的制约，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必须成为上海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第一市策。当然，上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非没有阻力。从今后一个较长时间考察，基础设施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制约将超过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制约。而基础设施的健全又正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因此，为了减弱资源约束型经济波动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必须从现在起全面加速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股份制企业的安排、建设资金的筹集、银行信贷和税收政策上全面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以保证上海在90年代能基本建立起一个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投资环境，这对上海避开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负面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